

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

四庫未收書輯刊

北京出版社

首卷・目錄索引

四庫未收書輯刊

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

北京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四庫未收書輯刊 /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編纂委員會 編

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8

ISBN 7-200-03471-1

I. 四…

II. 四…

III. ①百科全書-中國-現代 ②古籍-中國-選集

IV. Z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13271 號

Z68/101

責任編輯：楊良志

四庫未收書輯刊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編纂委員會 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

郵政編碼：100001

北京出版社發行

新華書店經銷

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

開本：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1/16

印張：一四八〇一·五印張

二〇〇〇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一—三〇〇套

定價：人民幣壹拾捌萬圓

ISBN 7-200-03471-1



9 787200 034714 >

ISBN 7-200-03471-1/Z · 298

前言

自清乾隆時《四庫全書》及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編纂完畢，二百餘年來，為之而展開的一系列批評、考證和研究，逐漸形成了一門『四庫學』。本世紀二十年代末，三十餘位國學大師開擬了一串有二萬餘條目錄的書目，名曰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，試圖補《四庫全書》之未備，並將『四庫學』發揚光大。時至今日，隨着對《四庫全書》進行的一系列實質性的增補，『四庫學』已蔚為『顯學』。

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主要收錄清乾隆時四庫館臣未見和清乾隆以降至清末問世的書籍，幾乎網羅了當時存世的《四庫全書》以外的優秀典籍。國學大

師們在新思潮的影響下，摒棄狹隘的民族思想，超越學術派別的偏見，對整個目錄進行了嚴肅認真的遴選和編排，不僅著錄了所選每種書之書名、著者和版本，並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體例，為各類書撰寫了『序言』和『按語』；將重要者定為『著錄』，擬影印出版；次要者定為『存目』，僅存目錄。後因『九一八事變』，影印出版計劃遂遭擱淺。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正是在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的框架內徵訪善本秘笈編纂而成。既為保存古代優秀典籍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；亦為了却先輩國學大師們的夙願。

參與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擬目工作的三十餘位國學大師，他們各自在

經學、史學、釋道諸子、詩詞小說和目錄版本學方面都瞻見博聞，超超玄著，有極高的學術造詣。如柯劭忞：清光緒進士，一代儒宗，一九一四年任清史館總纂兼館長，著有《春秋穀梁傳補注》、《新元史》、《蓼園詩鈔》等；江瀚：一九一二年任京師圖書館館長，以治《詩經》名重當時，著有《詩經四家異文考補》、《孔學發微》等，尚秉和：清光緒進士，精研《易》學，著有《辛壬春秋》、《焦氏易詁》等；傅增湘：清光緒進士，曾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，著名藏書家，精於目錄版本校勘，著有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、《雙鑑樓善本書目》、《清代殿試考略》等；羅振玉：清末任學部參事，古文字及考古學家，著有《殷墟書契前編》、《殷墟書契後編》、《流沙墜簡考釋》、《三代吉金文存》等；葉啟勳：家學淵源，以目錄版本見長，著有《四庫全書》目錄版本考、《拾經樓藏

書題識》等；胡玉縉：俞樾、黃以周高足，長於三《禮》、小學及目錄版本，著有《說文舊音補注》、《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〉補正》等；王式通：清光緒進士，曾任清史館纂修和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副委員長，精研歷史地理，著有《弭兵古義》等；奉寬：精通滿蒙文字，長於典章制度，著有《元國書字母表解》、《元國書官印考釋》等；王樹枏：清光緒進士，曾任清史館國史編纂處總纂，蔣枕圖史，時人目為通儒，著有《廣雅補疏》、《離騷注》、《新疆山脈圖志》等；賈恩紱：長於方志地學，著有《直隸通志》、《水經注糾謬》等；夏孫桐：清光緒進士，曾任清史館總纂，擅長史傳詩文，著有《悔龕詞》、《觀所尚齋詩存》等；倫明：坐擁書城，精研目錄版本學，著有《續書樓藏書記》、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、《漁洋山人著述考》等；謝國楨：治明清史學，精義入神，著有

《增訂晚明史籍考》、《清開國史料考》等；楊鍾羲：清光緒進士，以集部詩詞見長，著有《雪橋詩話》、《駢體文略》等；周叔迦：窮究佛旨，綜理二乘，著有《牟子叢殘》、《唯識研究》、《中國佛教史》等。在近現代中國學術活動中，有如此眾多的國學大師親身參與同一項學術研究，是絕無僅有的。

國學大師們在一些『序言』、『按語』以及『整理筆記』中，對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之目錄體系的確立、類目的劃分以及典籍的遴選都有精闢的論述，其中也貫穿着他們精深的學術思想，特別是對清乾隆以後至清末學術積累及其嬗變的認識和總結。

如在『易類·序』中認為『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分其為二派六宗』，而自乾嘉以

來，『說《易》之家莫不以京、焦、虞、鄭為依歸，而專闡明義理較少』，因而『非能盡其全體大用也』。指出清代《易》學的局限。究其實，這種推崇漢學，訛議宋儒的風尚，表現在清代整個經學研究上。『詩類·序』又指出了這種風尚的細小變化：『有清之初，閻若璩作《毛朱詩說》，謂「朱不盡非，毛不盡是」，蓋不失為持平之論。而朱鶴齡《詩經通義》則專主《小序》，而力駁廢《序》之謬。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亦以毛、鄭為宗，往往掎擊朱熹《詩集傳》。其實鄭箋多與毛異，故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遂黜鄭箋，以申毛《詩》一家之說，然或無傳，顧每陰用鄭義藉補毛闕。迨道光間魏源說《詩》，又翩然反之，輒援齊、魯、韓三家舊說，以攻毛、鄭，是殆亦相激使歟。』主張『承學之士，要在深味孟子「以意逆志」之言，而默會漢儒「詩無達詁」之訓。』并綜理漢宋之

學，指出《詩經》的本質：『《詩》之要點有四：《詩》之本身為文學作品，其描寫情感景物，細緻入微，為中國文學之祖，故以批評文學之眼光論《詩》，此為治《詩》之一法；顧《詩》雖為文學作品，必有其時代之背景與作者之感情，考其世本地望、當時朝政禮俗善否，與夫詩人之旨，亦為重要工作之一；《詩》為周人所作，所用古訓、古音，多與今日不同，居今日而欲理董古代音訓，舍《詩經》無可據者，此小學家之所當究也；至於典章制度，以及草木鳥獸之名，亦多識者之所留心。』國學大師們正是基於這些觀點，擬定了『詩類』目錄。在擬目後的『詩類·整理筆記』中寫道：『《詩》有今、古文之別。今文者，齊、魯、韓三家《詩》也；古文者，毛《詩》也。其說義往往與三家不同，今文家多訾為偽，然其義亦有長於三家者。漢儒治《詩》，訓詁聲韻，是其所長，乃若

訓說《詩》旨，多涉牽強；宋人治《詩》，於音訓雖疏，然其涵蘊體貼，「以意逆志」，此亦「知人論世」之道也。是以宋人說《詩》，其精當處往往超軼漢人之上。前四庫館臣撰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獨尊漢學，毋乃限於門戶之見也乎。《詩序》之說，自漢以來，紛如聚訟，訖今莫決；今觀三家《詩》，亦皆有《序》，非獨毛《詩》為然。蓋《序》是漢代經師隨文所加，本非定解。宋儒若朱子、程大昌、王柏等皆力攻《毛序》，斯為特見。前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·序》譏程大昌、王柏等為「橫刪聖籍」，並斥不採，何耶。『國學大師們超越門戶拘牽，梳理清代經學研究嬗變之跡，論《詩》今古文之短長，評論公允，言簡義賅，較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一味崇漢黜宋之言，尤能實事求是。』

對於一些新學科的出現，國學大師們從全新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論述，從中

可以看到他們對舊學的反思及其確立、劃分新學科之類目以及分類原則的根據。『小學類·甲骨之屬·序』：『甲骨刻辭者，殷商一代卜貞之辭也。殷人祀鬼，其俗尚卜，舉凡王室征伐、遊獵、祭祀，以及天象變異、歲時豐歉、人事往還，莫不用龜卜以占其吉凶。卜貞之辭，刻於甲骨，史官儲之，逮殷室亡而斯物沈埋，迄今歷三千祀矣；有清光緒之年，始復顯於人間。於時中外篤古之士，競相研求，若羅振玉、劉鐵雲、孫詒讓、王國維諸君子，或為著錄，或為考釋，後殷契之學，成為耑門。迄乎近世，為者益衆，鑽研益精，其見偏於藝林者，已蔚然為大國矣。而承學之士，或以其發見也晚，部類未立，以之附麗於「金石」之末，非其宜也。夫殷墟卜辭，其事則史，其文字則殷商之真古文也。自秦一字內，斯相奏同文，而後古文滅絕，字學大壞。漢許慎集古今書體，為

《說文解字》，深究字例之條，為之類聚群分，而綱領初明。今觀其書，於文字偏旁，昧於所從者，在在而有。其故何也，蓋文字發生，以至凝成定形定讀，其中歷經嬗變，不考夫古文，不足以究其原；不辨乎俗體，不足以明其變。許君生乎西漢之季，古文已亡，不惟殷商文字無由獲睹，即周初之鼎彝銘文，亦未常多見，而其叙言秦書八體，亡新居攝，時有六書，體勢雖衆，則皆當時通行之文字。即其所謂古文者，亦僅孔壁中書，乃六國文字，非真古文也。未能復見遠流，而欲究洞秘妙，不已難乎。然則居今日而究古今文字嬗變之迹，以匡許君所未逮，舍甲骨文而莫由。』因此認為應『入「甲骨」於「小學」之部』。此類一分，於古文字研究新闢一部域，遂納甲骨研究於科學軌途。

『小學類·音韻之屬·序』：『近世歐學東漸，瑞典學人高本漢，以世界音標

代字母，而搜集各地之方音以作古音之比較，中土人士多效之。然其術，視反切舊法尤為精密。此又後學勝於前修者也。』并明確規定『音韻類』應從三方面擬目：『溯源《詩》《易》，旁摭諸子，下及楚辭漢賦，《說文》形聲偏旁，以考唐虞三代秦漢之音者，古韻之學也；以《廣韻》為宗，由《廣韻》上徵《切韻》，下證《集韻》、《平水韻》，以考魏晉六朝唐宋之音者，今韻之學也；辨字母之清濁輕重，區韻攝之開闔弇侈，使反切之術，部居秩如，眇合無間者，等韻之學也。』因為『明乎古韻可以識往，明乎今韻可以察變，明乎等韻可以審音。』至今尚為篤論。

國學大師們認為《四庫全書總目·政書類》的內涵不甚明確，亦不適應清中葉以來政治社會變化的需要，故重新界定了『政書類』的內涵。『政書類：序』：

『政治典章，隨時代為轉移，亦由疏闊而臻於縝密者，因革弛張，備稱紛紜。故官私錄載，成書甚夥，流傳既廣，蔚為文獻之淵藪；借鏡考徵，咸資賴之。前目取錢溥《秘閣書目》「政書」之名以標稱，復依六官職事以析屬，位次群書，尚協包括。惟自道光中葉，中外訂約，海禁大開；交涉事蹟，初設總署以綜折衝，嗣該外部以專典守，而位冠列曹，尤為創局；其約章成案，自應循例闢屬以居之。又居官政錄，謀國論言，前目或登「文集」，或廁「傳記」，又或入之「雜史」，乃核其所載，類皆公牘；而政情民風，多裨參助，固不能以尋常文藝、一人治譜視之；亦納諸本類。』

中國傳統舊學重儒輕農，故《四庫全書總目·農家類》合『著錄』、『存目』僅十九種；而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·農家類》共擬目二百三十種，參考諸家分

類法，定為九類，較之前人分類更為科學。『農家類·序』：『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以「農家」類目繁夥，出藝植、牧漁於「農家」而入「譜錄」，實近效初堂之例，遠法鄭樵豢養、藝植之體，而疏於辨體不辨義之旨；故限律雖嚴，每有牴牾，是則楚失而齊亦未得也。惟《齊民要術》、《農政全書》諸書，因事立例，部居州次，分類較為詳備。包世臣撰《齊民四術》，分農政七目：曰辨穀、曰任土、曰養種、曰作力、曰蠶桑、曰樹植、曰畜牧，雖甚得體，猶嫌未周。茲編遠參賈思勰、徐光啟之旨，近廣包世臣之例，折衷群義，析為九類：一曰總錄之類、二曰蠶桑之類、三曰藝植之類、四曰豢養之類、五曰水利之類、六曰災荒之類、七曰授時之類、八曰器具之類、九曰物產之類。凡茲九類，俱關農事，互見功能，合則全美，離則悉傷，萃衆而一之，固未嘗棄事而失理也。』并進一

步認為：『古佚農書，或屬罕見，然若《書》之「無逸」，《詩》之「豳風」，《大戴記》之「夏小正」，《小戴記》之「月令」，《爾雅》之「釋草」，《管子》之「牧民」，《呂氏春秋》之「任地」諸篇，俱應用裁篇別出之法，冠於「農家」之首，皆所以網掇遺言，不使稍有亡佚者也。』國學大師們這種『辨體』『辨義』，兼顧『事』『理』的分類思想無疑是進步而又科學的。

由此可見，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在文獻學和目錄學上都極具權威性，從而使在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框架內編纂的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在文獻的保存、類目的劃分、底本的遴選上都有充分合理的依據和可靠的學術保證。

《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》中包含了一部分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四庫禁燬